

---

#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 历史与当前研究的重点

于 光 远

---

—

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并未自称为社会学家，但是，我认为他们是真正科学的社会学的老祖宗。道理很简单，是马克思、恩格斯而不是别人第一次把对社会的研  
究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前人对社会研究的科学总结，因此又是研究社会的科学的基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出了这一点。社会学者喜欢引证的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关于社会学的那几段话，说得也是这个意思。列宁说象欧文“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一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专家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列宁全集第一卷第10页）我本来不想讲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外国的社会学家不相信历史唯物主义的人还很多，所以今天我也想简单地讲讲这个问题。

我最近去了一次德国，到了马克思的故居特里，也到了恩格斯的故居乌培塔。看到了不少与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和工作有关的文物。看来，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恩格斯比马克思的确略为早一点。收在《马恩全集》里恩格斯最早的一篇文章是《乌培河谷来信》。这篇文章发表在一八三九年三月到四月的《德意志电讯》报上，揭露了他的家乡资产阶级的伪善和愚昧，描写了当地劳动者——工人、苦力贫困的生活和受到当地教会中最反动的“神秘主义者”或“虔诚主义者”的精神上的毒害。如按年代排，恩格斯应摆在第一篇。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多四个月。在这篇文章中青年恩格斯就对社会作了详细的深刻的观察和十分科学的描述，这篇通信是一个有事实有分析的社会调查。

在青年恩格斯的著作中，属于社会调查性质的文章占有特殊的地位。收在马恩全集中的就有多篇这种文章，尤其是他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更是详尽深刻。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下半月，恩格斯到曼彻斯特，一个月之后他就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通讯寄给《莱茵报》。以后恩格斯还利用在他父亲办的企业中经商的便利和通过他的爱人纺织女工白茵士的关系，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调查。当他在—八四四年回到德国家乡时，写成了他的重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书中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在这

本著作的书名后边有一副标题：名叫“根据观察和可靠材料”。

恩格斯的第一部著作就是一部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社会调查，这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说明他对工人阶级的关怀、同情，特别是重视这个以后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是何等重视社会调查，重视研究社会问题的。恩格斯在这本书快完成的时候，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讲到：“我将给英国人编制一张绝妙的罪状表。我要向全世界控诉英国资产阶级所犯下的大量杀人、抢劫以及其他罪行，我要写一篇英文序言，打算单独印行，并分别寄给英国各政党的领袖、著作家和议员们。让这些家伙记住我吧。于是，不言而喻，我打的是麻袋，但指的是驴子，即德国资产阶级……”。《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出版后，恩格斯成了名人，他成名比马克思早。

马克思也非常重视社会调查，《资本论》就引用了当时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从社会学的观点看，这些调查报告是很有价值的。当时英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材料，是由于三十年代英国大宪章运动以后，作为一种成果，对工厂进行视察，反映工人状况的报告制度建立了起来，这使得马克思写《资本论》时可以大量引用。不仅如此，在《马恩全集》第十九卷上，你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写过一个《工人调查表》，就是对工人状况一个详细的调查提纲。这个表分四个部分，一共一百个问题，问题提得很全面、很具体。整个提纲在马恩全集中文本有十页那么长。为什么写这个调查提纲呢？据说是马克思给法国一家杂志写的，并印成单行本在法国全国发行，希望工人按照调查表所提问题来思考和回答。这个调查提纲是马克思在一八八〇年五月写的，离马克思逝世只有三年。

看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如何重视社会问题的研究，重视社会调查，看一看他们如何把社会问题当作最根本的问题来看待，看一看他们不象其它学派着重其它方面那样而是始终着眼于社会问题，用最大努力去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而且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第一次建立起真正科学的社会学，我认为把他们看作科学社会学的老祖宗这决不是什么偏见。当然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接受不接受这一点，我认为是无所谓的，我们不一定要和他们争论，如果有谁想同我们争论，我认为摆事实，讲道理，我们一定说的赢他们。

列宁也是很重视社会学和社会调查的。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列宁不止一次使用社会学这个名称，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大家知道列宁还有一本重要著作，名叫《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写这本书是因为当时俄国民粹派主张在俄国要避免资本主义发展、主张搞革命的空想。民粹派的理论是建筑在俄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的这个基础上，因此列宁搜集大量材料证明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确立了在俄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为俄国革命奠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列宁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俄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如果列宁不那么做，就不能解决当时的俄国革命问题。列宁在同民粹派的斗争中，后来在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也是坚持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和俄国社会的特点出发来解决问题的。列宁的办法就是对俄国作社会调查。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状况的社会调查是在他被沙皇抓起来，他被关在监牢里和被流放在西伯利亚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监牢里的时候，列宁的夫人给列宁想办法搜集他所需要的各种资料并设法给他送

去。在列宁被流放之后，他夫人也跟着到流放地去，给他当助手。列宁当时不可能象恩格斯那样亲自做调查，主要用的是别人调查的材料然后进行统计分析。

到毛主席这里，毛主席重视做调查是有很大贡献的。七八年我去过一次广州，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在陈列品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当年毛主席要那些学员回到家乡作调查之后所作的调查报告。陈列出来的报告，我看到的虽然只有几页，但从这几页来看，写的是很有意思的。毛主席就是把社会调查作为这个讲习所的一个重要课程。毛主席办农运讲习所的方针是非常正确的。通过这种调查使学生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政治，了解中国革命。同时也使主持这个农民讲习所的毛主席通过学生的调查，了解许多地方的社会情况。我没有更多的材料，但是我相信毛主席写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样的文章，同他重视调查研究甚至同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中要学生作社会调查可能是有关系的，关于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章的题目就把事情说清楚了。那是毛主席在对农民运动作了系统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写的。这个调查应该说是我们党调查工作的典范，在全世界这样的调查也是不多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和他同时代的共产党员来比，恐怕是最重视调查研究也最会做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也是最卓越的，而且是一直坚持这样做的。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到湖南作农民运动调查，以及后来在江西苏区作兴国调查、寻邬调查等等，这就使他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有深刻的理解和丰富的知识。而且他不但自己作调查，还教育别人去作调查。大家都还记得毛主席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提到过的纠正主观主义就是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要“使同志们懂得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坠入空想和盲动的泥坑。毛主席不但讲调查的必要性，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且讲调查的方法和调查的技术。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所写的文章，所做的调查，我认为，社会学者应该认真研究认真学习。在毛主席留给我们的许多宝贵的财产中，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和调查报告，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他作的调查目的性非常明确。比方他在湖南的调查，就是为了解决正确对待农民运动的问题，他在江西苏区作调查，就是为了解决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政策问题。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就是通过社会调查形成的，也是通过社会调查贯彻的。如果不做社会调查，就根本谈不上这种结合。如果毛主席不做那样的调查研究，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

应该指出，毛主席这么强调调查研究是同中国党内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密切相关的。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教条，不从实际出发来解决问题，而是靠引证来解决问题。一种是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问题。这两种态度的对立，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起一直斗争很尖锐。陈独秀、李立三、王明都是这样的代表。一个是做调查研究，一个是不做调查研究，从而一个是了解社会，一个是不了解社会。一个能做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一个根本不讲这个结合，这样两种态度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两种结果。毛主席是靠调查研究，战胜了那些洋教条，领导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不搞调查研究，我国革命就不能胜利。

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做调查研究，而且要对社会做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粗枝

大叶、一鳞半爪是不行的。不做调查研究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世界各国都是共同的。在中国党内由于存在主观主义的问题，并有一个来自外国主观主义干预的问题，所以调查研究的问题就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到四十年代，党中央在延安作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组织了比较系统规模的调查研究。当时决定每一个大区都成立一个调查研究局。党中央设立一个政治研究室，整个构成一个调查研究的系统。我就是那时候从中央青委调到西北局调查研究局去的。

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工作犯错误，有许多原因。我想忽视调查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九五八年掀起了浮夸风，没有很快进行调查研究去纠正，而轻听轻信。领导干部也下去跑，但那是参观的性质，浮光掠影，不但没能把浮夸风纠正过来，反而助长了这股浮夸风。下面写假报告，上面就信就传。我自己头脑那时也发热，做了很不科学的事。十年文化大革命，调查研究风气也就烟消云散了。在文革和“四人帮”横行期间，更谈不上什么调查研究，“四人帮”搞的那些都是假调查，都是为他们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的，都是假借“调查研究”之名，宣传他们那一套谬论，推行他们的阴谋，或者陷害我们的好同志。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党才逐渐恢复了党的调查研究的好风气。在这方面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问题，要作许多工作。

我去年到日本，见到一位社会学家福武直先生。他对我们恢复社会学很热心。他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一篇关于中国社会学的报道，其中讲了中国社会学历史。但是他是从解放前大学中搞社会学的历史说起，讲了燕京大学办的人文学报如何如何，没有讲我们党我们革命根据地的这段历史。这不能怪他，他不了解这方面的事情。我们没有宣传过。当时我简单地介绍了一番，他表示感谢。可惜时间所限，我不能详细地给他讲这段历史。我认为我们国家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解放前大学中开设的社会学课程，当时有不少学者到农村或别的地方去作调查。对这方面学者所做的工作要有恰当的评价，在讨论恢复社会学的那次座谈会上我就讲，一九三五年李景汉先生在清华所作的那次演讲给我们留下了回忆，费孝通同志也做了很多工作。另一方面，是我们党在社会学方面所做的工作。所以我对日本社会学家讲，如果共产党不做调查研究，它根本不能存在，更说不上能够取得胜利。因为不做这样的调查研究，党的社会政策那里来？革命政策那里来？难道它们能从天上掉下来吗？那里会有这种事情呢？我觉得即使没有用社会学这个名称，我们还是作了许多社会学方面的事情。当然不承认社会学这个名称是我们做的蠢事中的一个。我想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主张我们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要和各地搞社会学的同志们合作，把我们党研究社会学，作社会调查的资料搜集一下，作为我们党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课题。这是一个不太困难的课题，只要花一些时间就能画出一个轮廓来。我们不能数典忘祖。

## 二

上面我讲一段历史，目的何在呢？目的就在于要同志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上对社会所作的研究，是今后我们研究社会学的基础。要同志们注意我们马克思主义者

研究社会学有什么不同于资产阶级学者的特点。

我认为第一条是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也许有人会这样提问题，你们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主张结论只能从实际中来并要实践检验，反对事先定框框吗？这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矛盾吗？对这个问题我们回答说，不错。我们是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正是从实际出发，研究了实际情况得出来的，而且是由实践检验的确是真理的东西。因此回过头来又可以作为我们调查研究的指导。有些资产阶级学者不讲究这个，他们讲什么纯客观。什么叫纯客观性？如果讲我们一定要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客观世界，不作一点增加也不作一点减少，那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把它解释成不要任何思想指导，不受任何观点影响，那么我认为这种“纯客观”主义就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因为任何一个人的认识从来都不是从头开始的，都是人类总的认识长河中的一个环节，跟前人的认识是不能分割的。总是受某种思想来指导，总是受某种观点来支配。我就不信有什么不受任何思想指导、不受任何观点影响的“纯客观”的东西。某些社会学家强调的“纯客观”，本身就是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一种指导思想、一种观点。对于我们来说，问题是要一种怎样的指导思想，要一种怎样的观点。我们认为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才是正确的。别的不讲，只讲作为社会科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认为，它是科学的社会学的根本理论。究竟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还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根本问题。我们坚持这样的根本观点。这个指导思想是不是主观主义的？是不是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根本信条？不是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实际出发总结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总结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才得出了这个结论。难道我们不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去调查和研究，而要离开这个结论去作调查吗？难道我们应该从零开始先来肯定或者否定究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然后再去调查我们要调查的具体事实，研究我们要研究的具体问题吗？我认为如果有人坚持那么做，那么他什么事也做不成。我认为主张要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调查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丝毫主观主义的成份也没有。

我们要把社会学的工作研究开展起来，重点是要研究当前我国重大的社会问题。现在我们的社会问题很多，而我们社会学的队伍很小，怎么办？不能把许多问题摆在一边，只在某一个问题上作点调查。因为许多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去做调查研究，去设法解决。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适当集中在若干个重要社会学问题上，而不能只注意很少几个问题，丢掉其他重要问题。我们必须扩大社会学的队伍。现在我国社会学的队伍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历史原因，实在小得可怜，但是一定要大发展的。有了一支队伍，就可以把力量布置开，好进行作战。那么这个队伍怎么扩大？办法就是吸收各行各业的人来作社会学的研究，这一点有做到的可能。

现在我国的社会问题很多，一一列举很困难，就举几个例子吧。大家都认为，教育在我国今天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8岁的高中毕业生只有百分之四可以进大学，其他的人进不了大学，这个问题算不算一个社会问题呢？我看应该算。十八、九岁的中学毕业生考不上大学就在大街上晃荡，晃荡坏了，家里宁可出点钱让他们上学，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升学考试就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因此，就有一个扩大招生的问

题，就有一个广开学路的问题，就有一个职业教育问题。但是上面说的那一个，看来是社会问题，涉及的其实不只是教育问题，首先就涉及我们的劳动工资制度。既然我们一上大学就是铁饭碗，而不能上大学的问题就大了，就不知道是什么饭碗了。这样，高中升大学就成了他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假如我们想出一种办法，大学生将来毕业以后，还要根据量才使用原则，择优录取。部分经过学校保送，部分经过考试，而夜大电视大学等也有文凭，也有资格参加就业考试，考大学的矛盾也许就缓和一点。当然夜大、电视大学的教学条件不如正规大学，没有那么好，但是同样可以出人才。

再举个例子，工资收入也是个社会问题，要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来研究。德国的办法，把工资和受职业培训、考试结合起来。九年义务教育完成后，你不进学校也可以，你作工（当然找工作困难些）不能算作技术工人，一个月工资一千马克。假如你接受了三年到三年半的职业培训，你就是技术工人，工资就是二千马克一个月。进学校去接受培训和毕业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这样，升级就和技术提高和考试结合起来。你在职业培训后的工资，就比未接受培训的人高一倍。如果在职业培训中学得好，自己还想升学，再进三年高等技术学校，毕业后就是技术工作人员，工资两千七百马克，一下子加七百马克。如果不是念三年，而是念六年书，工资就是三千五百到四千马克。不经过学校，从一千马克到两千马克，从两千马克到两千七百马克，从两千七百马克到三千五百或者四千马克是很难提上去的。在那里工资就同技术水平联在一起，而技术水平就要经过考试，没有我们评级这一说。

再举一个例子，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在我国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中国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00人，在世界上不算是最高的，也算是很高的。我研究了一下，土地面积在十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国家中，人口密度超过中国的，在一百零二个国家（地区）中，只有十二个。我这样做，是想把一些很小的国家除外，那些很小的国家（地区）人口很密，比中国人口密度高的还有四十五个，但这同我国不那么好比较。比方说有二十八个是面积不到一千平方公里的国家和地区，严格说来就是一个城市。象新加坡土地面积是581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是近四千人一平方公里，不好拿来和中国相比。再加上中国有百分之十九的难以利用的沙漠、雪山、冰川。而且中国耕地特别少。所以中国人口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应该提倡节制生育，提倡计划生育，但是在这个工作中问题很严重。许多地方搞土政策，多生孩子随便罚钱，随便定出不许入党入团，不许升级等不合法的规定。有的地方强迫引产，强迫搞绝育手术。我们国家是从半封建社会来的，弄得不好，什么问题都有可能按封建的办法办。所以，人口问题还要深入一下，不深入调查解决不了，因为这是很复杂的问题。

和人口相联系的是土地问题。最近我考虑一个问题，想推动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这门科学我想叫做《国土经济学》。我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沿海大陆架，领海等这么一块土地，怎么对策。我们国家同国土有关的部门很多，但从未把国土问题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我们政府也没有专门管理国土的机构。外国如意大利、法国、日本、朝鲜、墨西哥等，都有国土管理部门。我是从人口问题想到土地问题的，因为土地与人口是密切相关的，人口问题最近讲得很多，我觉得应该把土地问题提到同等重要的高度来认识，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我国的土地利用得怎么样？我认为如果只讲

人口问题不讲土地问题，那么对人口问题的评价就是片面的。今年五月我到广东翁源县去了一趟，那里整个土地都可以长树木，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一百一十多人，不算多。我一到县城只看到大街上张贴着大标语：“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光荣，多生孩子可耻”，而并没有开发土地资源的计划。把人口问题不和土地问题结合在一起考虑，人口问题就成了孤立的问题了，这样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中国国土的情况，许多省都说自己那里是七山一水二分田，根据这个情况，我们确定要在山上下功夫，确实应该把发展林业、畜牧业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里涉及许多社会问题。

还有许多社会问题，如青年犯罪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社会风气问题，我不一个一个来讲了。

上面我说到计划生育工作中有封建主义的表现。的确在农村工作中好多问题常常牵扯到宗派问题，个人恩怨问题，更多地涉及某些干部强迫命令，作威作福问题。这些事情都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问题，在我国并没有解决。这是许多社会问题发生的原因。我们研究社会学的，要把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封建思想调查一下，看看到底有哪些宗法制的残余，封建制的残余。当然半殖民地的东西也有残余。对国外资产阶级的思潮、学术观点，用骂倒的办法是不行的，当然拜倒也不行，这两个“倒”我都反对。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意共贝林格所说的，意共愿意公开地同现代思想的所有派别进行对比。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不过人家又不肯认输，就得发奋努力准备好意见再去比，相信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这点不是自己说了算数，不是关上门自我欣赏，而是要出去见世面，和所有思潮进行对比，骂倒和拜倒都是不符合这个思想的。

现在很多人对社会学关心，但社会学研究工作刚开始。我认为空洞的东西应该少研究一点，实际的社会问题要多研究一点。我当然不是说赞成胡适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口号。我是主张又要研究主义，又要研究问题，把研究主义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而不是空洞地谈主义。谈问题就要实事求是的谈问题，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研究问题。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资格发展所有社会科学的学科，研究所有重要的社会问题，组织一个完整的社会科学战线，而社会学在这个战线中是居于很重要的地位的。